

民国时期上海银行界的风险意识

略述上海钱业业规的制订

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中国征信所及其信用调查

浅析1925年上海总商会的

略论1920年上海中外钱业联动关系

近代上海工商业同业公会机构和职能述评

从同业公所到同业公会

民国时期上海旅业同业公会浅析

刍议近代上海缫丝业同业团体的变迁

水电煤：近代上海公用事业的演进及华洋之间的不同心态

上海华界市政及其地方自治遗留档案

上海旧保甲制度的废除与里弄居民委员会的诞生

解放初期上海对摊贩的管理

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卫生管理述评

工部书信馆及近代上海邮政(1843—1897)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述略

上海公共租界的地产登记制度(1843—1930)

从清末上海开埠

20世纪

档案里的上海

上海市档案馆 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档案里的上海

DANGANLIDE
SHANGHAI

样-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档案馆 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档案里的上海/上海市档案馆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2
ISBN 7-5326-2154-5

I. 档... II. 上... III. 上海市—地方史—档案资料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2300 号

出版人 张晓敏
统 筹 王圣良
责任编辑 薄铁炼
装帧设计 何香生

档案里的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上海华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86 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6-2154-5/K · 394

定价: 3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2663733

《档案里的上海》编委会

主 任 吴 辰

编 委 仓大放 顾林生 程绣明 朱金铃
马长林 冯绍霆 邢建榕 庄志龄

执行主编 邢建榕

特约编辑 朱 榕

序

吴 辰

档案既是历史活动的真实记录,又是现行活动的重要依据,是一种宝贵的信息资源。随着档案工作的日益发展和社会对档案工作的认识,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同。在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为领导科学决策服务,为社会大众服务。近年来,上海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研究和加工整理的过程必不可少。档案工作发展到今天,各级各类档案馆的建设成绩斐然,馆藏丰富、管理先进、服务规范和数字化建设进展神速,这一切都为深层次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档案内容的研究是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深度开发的体现,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高级阶段,只有在对档案内容进行研究之后,才能卓有成效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而且,我们的研究愈透彻,我们的工作就会愈到位,社会对档案信息资源的认知程度就会愈高。所以,档案与历史的关系密不可分。档案工作者如果不懂历史,对相关档案内容不熟悉,对档案内容所处的时代背景也不了解,那么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工作,无论如何是做不好的,或者说做不深的。今后,我们一是要进一步加强档案内容的研究,进行档案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多出成果;二是要加强业务人才建设,多出专家。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而且都能为资政服务和大众服务提供支持,为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

多年以来,上海市档案馆的研究人员一直在从事档案史料的研究,汇编档案史料,撰写有关档案与历史的著述,参加有关的学术活动,在上海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有的同志已被相关大学聘为教授、博导、

硕导,这是可喜可贺的现象。他们的研究工作,虽然一直是默默无闻的,但在我馆的实际工作中已经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随着档案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研究力量,特别是高校、社科院、各级党史研究部门及其他各类研究机构,对于档案内容的研究,也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为此,我们应当加强与社会研究力量的合作,以起到“1+1>2”的效果,将档案信息资源尽可能地挖掘出来、提供出来,为社会发展服务。

有鉴于此,为进一步促进档案史料的开发,并为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切磋的平台,我们将我馆研究人员近年来在上海史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选择一部分予以结集出版,取名《档案里的上海》。此举无非是想说明该书的许多文章充分利用了丰富的档案史料,是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题材也很广泛,涉及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如经济方面有关于近代上海银钱业业规、近代中国信用机构的建立与运作、民营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协作组织、银行业风险防范意识等;社会团体方面有近代上海工商业同业公会如上海木业、旅业、缫丝业同业组织的近代化历程;市政管理方面有近现代上海公用事业的演进、上海华界市政管理及地方基层组织机构的研究等。在租界史研究方面,更有公共租界地产登记制度、租界邮政机构、租界卫生管理及工部局乐队的历史等;文化教育方面有对清末上海书目、近代上海的社会教育、寓沪法侨的艺术生活的研究等;人物方面有对银行家陈光甫、企业家吴蕴初的研究等。同时,此书还配发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近现代上海的百年沧桑巨变,尽可能使学术性和可读性相统一。

衷心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得到档案界、史学界和社会各界朋友的批评、指正。

2006年11月20日

(作者系上海市档案局局长、上海市档案馆馆长)

目 录

工商经济

- 马长林 民国时期上海银行界的风险意识..... 3
- 冯绍霆 略述上海钱业业规的制订 15
- 庄志龄 20 世纪 30 年代创办的中国征信所及其信用调查 32
- 杨天亮 浅析 1923—1937 年的四行储蓄会 45
- 何 品 略论 1920 年代上海中外银钱业的互动关系
——以上海中外银钱业联合会的筹建为例 66

社会群体

- 郑泽青 近代上海工商业同业公会机构和职能述评 83
- 朱 榕 从同业公所到同业公会
——1858 年至 1937 年上海木业同业组织的近代化 94
- 黎 霞 民国时期上海旅业同业公会浅析..... 116
- 张姚俊 刍议近代上海缫丝业同业团体的变迁..... 133

市政管理

- 邢建榕 水电煤:近代上海公用事业的演进及华洋之间的不同心态 147
- 张爱平 上海华界市政及其地方自治遗留档案..... 164
- 朱国民 上海旧保甲制度的废除与里弄居民委员会的诞生..... 171
- 张 辰 建国初期上海对摊贩的管理..... 185

目 录

租界经纬

马长林	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卫生管理述评·····	195
黎 霞	工部书信馆及近代上海邮政(1843—1897) ·····	210
张 新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述略·····	224
孙 慧	上海公共租界的地产登记制度(1843—1930) ·····	236

文化教育

冯绍霆	从清末上海几份书目说起·····	251
庄志龄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社会教育 ·····	264
曹胜梅	寓沪法侨的艺术生活(1865—1947) ·····	278

人物春秋

邢建榕	徘徊于新旧时代之门:1949 年前后的银行家陈光甫 ·····	293
石 磊	简论近代上海银行家在金融体系建设方面的努力·····	308
陈正卿	“天字号”企业档案与吴蕴初的企业活动 ·····	318
彭晓亮	关綢之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	332

工商经济



GONGSHANGJINGJI

□ 马长林

民国时期 上海银行界的风险意识

民国时期,主要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上海银行业高速发展的时期。其间不但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新华银行等为代表的一批在南方起家的商业银行在存放款业务和银行资本方面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即使曾经在北方称雄的盐业银行、金城银行等银行也纷纷将营业重心向上海转移,拓展业务,由此奠定了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1]。二三十年代,虽然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对于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各种机遇,但也充满着各种经济风险和危机,如1921年的上海信交风潮、1927—1928年间国民党政权对上海实业界的榨取、1932年的公债风潮、1935年的白银风潮等,都曾经使上海金融界受到相当大的压力和不同程度的冲击。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上海银行业仍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领衔的商业银行,其增长速度极快^[2]。究其原因,除了这些银行重视经营特色,注重服务社会,加强内部管理,吸引和培养人才,开拓和发展新的银行业务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银行管理者风险意识的增强和由此采取的各种规避风险的措施。正是这种日益明确和强烈的风险意识和不断发展实践的规避各种风险的措施,才使这些银行在充满风险的环境中能够处于不败之地。现笔者根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等有关档案资料,对这一时期上海银行界风险意识产生的背景、相关表现等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专家。



外滩成为中外银行抢滩之处

一、风险分散原则的提出和贯彻

银行作为金融机构,资金运作是其主要业务,也是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支撑点。一般而言,银行资金运作量越多,运作次数越频繁,其资金的增值幅度越大。但银行的资金运作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特定时期的宏观经济状况及资金运作对象境遇的不同,都会对银行经营效果产生影响。因此,在银行经营高收益的同时也伴随着高风险。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国外一些金融理论的引进和介绍,已有一些金融理论家就银行风险防范问题发表意见。银行风险防范,涉及方方面面,而风险分散主义理论,可以说是当时风险防范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种。这一理论认为:银行无论是放款、吸收存款,还是接受抵押物品,都切忌集中于一处,而宜采取分散主义原则。例如放款,对于匹头业五金业粉麦业及其他各业,适宜于各占十分之一,这样假如“对于匹头业之放款纵使不能收回,则尚有十分之九,可以无虞,尚不至于立即引起巨大影响,若偏于匹头业,则其势危矣”。同样,当银行“借出资金时,不可偏于一种职业之

顾客,其在平时,虽无任何变动情事,究以采取危险分散主义,俾谋平安之为是”。对于抵押品也是一样,“如抵押品偏于一种物件,则经济界一有变动,其市价跌落时,势必难于立即脱手,故抵押品不偏于一种,其危险分散,较为平安也”^[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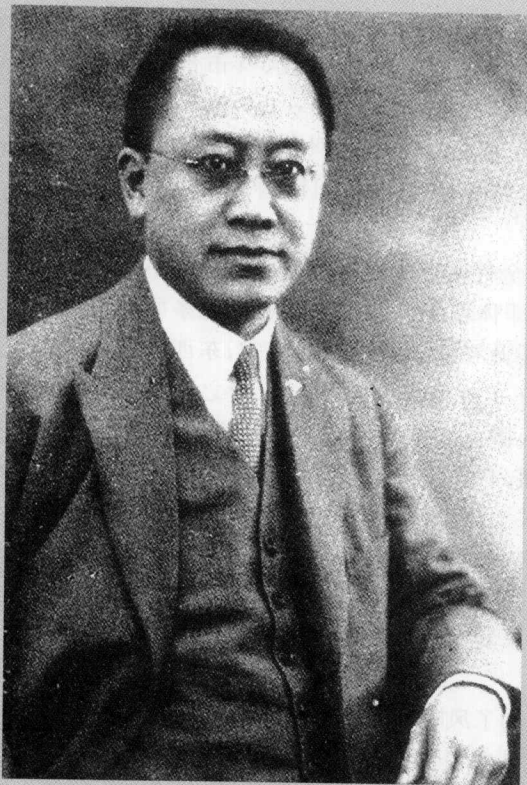
这一风险分散理论,对上海银行界的有识之士来说,当然是很具指导意义的。我们从当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的一些经营思想和经营实践,可以看到受这一理论的深刻影响。

1931年初,市场不稳,金融危急,陈光甫在向全行所发的通函中提出了六项不可原则,其中第四项为“不可多放[款]同样工厂”,即体现了风险分散原则。此条原则规定:“银行放款之要谛在于风险之分散。中国于此初无银行法令之规定,东西方各国则皆有明文限制,对于顾客之放款额只许可在实收资本及公积之十分之一以内(日本正金银行条例及美国国立银行法),盖一人事业之成败,万难预知,推而广之,即一业之盛衰亦万难先定。例如有时花纱业极盛,有时花纱业全体失败,有时米粮业极盛,有时米粮业全体失败,若银行放款专集于某一业,该业盛时反不能期其万全,衰败时则不可救药……现本行关系之纱厂已有十家,关系之面粉厂亦有十家,每年通融款项已不在少数,则二业之盛衰成败皆与本行有巨大之关系,何况中国厂家尚少有新式之经营合理之组织,则此后决不可再与二种厂家发生不可分离之关系,是为当务之急。”^[4]这些内容,充分体现了风险分散原则。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企业的投资,也完全贯彻了风险分散的原则。据1934年统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71家企业进行了投资,其中投资额超过5万元的企业只有10家,分别为:

中国建设银公司(投资筹建浙江钱塘江大桥)	20万元
交通银行	12.5万元
中国银行	23.2万元
永利化学工业公司	97.5万元
商办闸北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5.17万元
英美烟公司	5万元
南通大储公司堆栈	7.5万元
蚌埠公记堆栈	5.5万元
宝丰保险公司	20万元
上海自来水公司	12万元

对其余60余家企业的投资,少则几千元,多则一二万元,足见其用于企业投资资金之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

分散^[5]。

长期以来,陈光甫一直以“服务社会”作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经营宗旨,不断向银行的职员进行宣传。在强调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时候,陈光甫也将它同风险的避免联系了起来。他说:“欲求服务社会,吾人必须力求资金之安全。资金之来源,小部分为股本,大部分为存款,存款增加,资金充实,而后服务社会之功能,可以扩大。”要“使存款人士对于本行之经营有不可动摇之信仰”,“必须采取最稳健之经营方法”,“故一切经营之方法,以资金安全为第一要义”^[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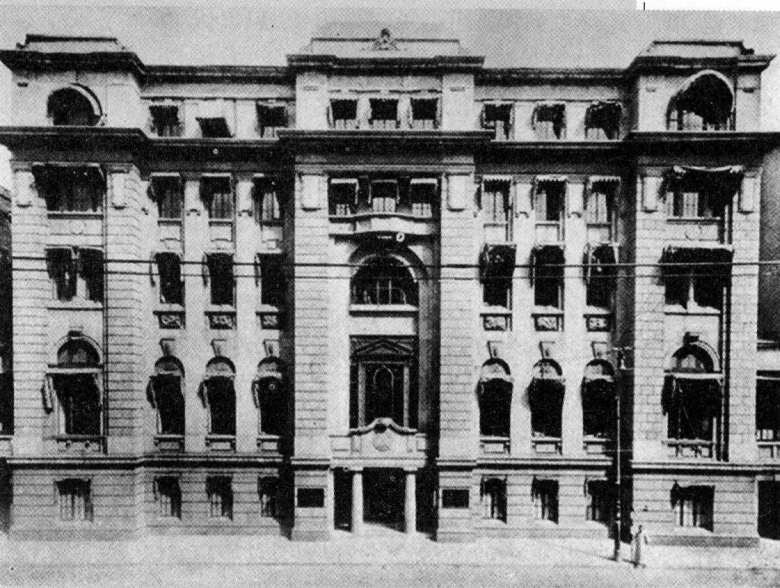
为了确保资金运作的安全,陈光甫强调必须切实掌握贷款对象信用的可靠程度。他指出:“银行押款之财源多仰赖于存款,万一发生变故,不特银行自身深蒙损失,且直接害及存户,故在贷款之先,无论有无抵押,皆当调查信用,严定额度,尤其有抵押品者更当调查押品之货色之来源、销路、等级、价格及今后市场上之情形与历来之趋势,不致到期发生不能收回之虞。”^[7]针对银行过去在信用放款方面的疏忽,陈光甫强调指出:“查本行过去之信用放款办法,对借款人每多以交往为主,至于信用之调查或反忽视,其所注意者,不外三点:(一)东家[资]产之多寡;(二)开立年限之长短;(三)同业有无放款。殊不知:(一)东家资产虽多,并不足恃,盖有10万资

产者,彼可以其资产为号召,负债或已 20 万元;(二)中国社会向不重组织,只以人为转移,年限愈长者,其内容或愈腐败;(三)同业对于放款向取秘密,于倒帐之后,始行布露,虽事后合作追查,然已晚矣。”“故各行今后对于信用放款,未放之前,应有周密明确之调查,既放之后,营业员尤须从事每月循环调查报告”,使“我人得以预有防范之机会,此乃主管员及经理之责任”。“放款之要点,在于风险之分散,斟酌权衡,将资金分放于各业各户,寓保险于放款之中,庶不致因一户或一业之失败,而危及全局。总之,各种放款,在未做之前,固当切实调查,审慎从事,以免见欺于人,而于既放之后,已利已与相共,尤不能不时时注意,存优汰劣,以免发生呆帐,招致损失”^[8]。这些观点,反映了陈光甫为确保资金运作的安全,十分重视在放款前后对放款对象信用情况变化的严密调查和掌握。

在陈光甫确保资金运作安全思想的指导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此专门建立了放款委员会。鉴于“欧美各国之较大银行,无不有放款会议,且多每日会议一次,并规定每笔放款数目若干,由重要职员几人,共同负责,办法至为严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此将各分行已经建立的放款研究会一律改称为放款委员会,以便“对于借户信用之好坏,营业之浮实,押品销场之畅滞,折扣之大小,无一不研究透彻”^[9]。

1934 年,为了确保对棉纺企业投资资金的安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组织设立了棉业研究会,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研究如何可使放款不致有危险^[10]。因此时上海银行在工业放款方面,自 1932 年后对纱厂的放款一直占 50%,1934 年甚至达 65.9%,为 2 441 万元,1933 年对申新纱厂的放款居首位,达 1 322 万元,占上海银行对整个纱厂行业放款的 58.6%^[11]。这种将巨额资金向某一两家企业投放,显然同风险分散主义原则相抵触,为此组织一棉业研究会,以避免在棉业投资方面可能遇到的风险。

除了针对放款对象的信用调查,为维护自身的安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十分重视为应付突发的非常事件而进行的调查、预测及应变措施的制定。30 年代初,继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在中日战争危机日益迫近的情况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人员根据调查分析,制定了一份“中日一旦宣战在银行立场上如何应付之推测”的咨询报告。该报告指出:在全国即将进入战时状态,人心恐慌之际,“在银行立场上应如何事先谋应付之方,实为今日最切要之问题”。报告分析了中日战争一旦发生后日军可能采取的进攻路线,战争发生后上海、南京、济南、山西等中国各重要城市的处境和全国金融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就银行业务开展来说将存在比较安全区域、比较危险区域和最危险区域,建议在济南、济宁、南京的分行,暂停一切放款业务,在郑州、开封的分行,抵押放款和信用放款绝对不



金城银行上海总行



上海银行界的专业刊物《银行周报》

做,在安全区域内的分行,控制放款限额,并以粮食放款为主^[12]。这种对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预测并提出相应的应变措施,对于避免银行在突发的战争状态来临时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二、信用调查理念的发展和实施

对于银行来说,准确及时地了解 and 掌握资金运作对象的信用状况,确实至关重要,20年代初,上海银行界的专业刊物《银行周报》上刊登了多篇文章,专门阐述信用调查与银行的关系、信用调查之价值、银行的信用调查部等问题,将银行进行的信用调查同风险预防联系起来,认为“当今之世,银行业务非有信用调查以为之辅,决不足以分散其危险,并预防其危险”^[13]。“各银行依照其信用调查部之调查报告,小之则可据此决定放款贴现之方针,大则营业之前途均以此为转移之趋势,故信用调查部,其事情极为重要”,“实为增进安全之幸福,足以预防市场之恐慌”^[14]。

我国华资银行专门组织调查机构从事信用调查等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应该说是最早的一家^[15]。早在1919年上

海商业储蓄银行即设立了调查部^[16],经过多年运转,调查制度日趋完善。就信用调查而言,分为内勤调查和外勤调查两方面,内勤调查则分为整理材料、建立分类和索引档案、对各种数据进行统计、撰写各种报告等。外勤调查则分为分类调查、商品调查、不动产调查、帐务稽查。同时,对于信用调查的要素也把握得十分清楚,即信用调查注重三个C字:Capital(资产)、Capability(能力)、Character(人格)。所谓人格,包括放款对象可信赖的程度、过去的经历、沿革基础;所谓能力,包括其营业的手腕、经营态度、金融关系、交易情形、同业情形;所谓资产,包括其纯财产、借贷情况等^[17]。

当然,银行界对于信用调查的重视,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家,开办历史较早而在金融界颇有影响的商业银行金城银行于1934年将总经理处业务科移往上海,由总经理周作民亲自兼领科长,当年即在上海专门成立调查部,重点办理信用调查。调查部制订的调查办法规定:“凡与本行业务有关之工厂商号等,经总经理处业务科或各分行营业部随时指定者,皆由本部调查,其营业状况编为报告呈总经理及委托之科部备用。”“凡米麦棉三业之工厂商号行庄”、“煤业矿厂商号”等“营业状况无论有无指定之对象皆逐渐加以调查,编成报告”。调查内容除经特别指定外大致包括有关调查对象的下述方面:1. 成立以来略史;2. 资本额;3. 资本组织形式(有限公司、无限公司、合资独资等);4. 内部组织;5. 负责人及其简历;6. 近年营业状况及盈亏情形;7. 发生往来之银行钱庄;8. 发生往来之工厂商号;9. 平时信用;10. 目前债权债务情况^[18]。

值得注意的是金城银行调查部在成立不久就聘请了经济学家刘大钧担任顾问。刘大钧每星期去金城银行三次,对调查部工作进行指导,有时还亲自参与修改调查报告。已经担任了数年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所长的刘大钧,在当时已颇有知名度,他曾主持过好几项经济调查,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在指导金城银行调查部开展调查的过程中,刘大钧对信用调查方法及内涵发表了十分重要的意见。他指出:“信用调查与经济调查不同,经济调查即以业为单位,与各行号本身利益无妨碍,故易得实情,而全业变动亦比较为少。至信用调查,则与各行号本身营业有关,不独本行号之人不肯据实以告,即往来行号亦常不肯代为发表,故必须旁敲侧击,向所有往来之银行钱庄商号等间接查询,始能得其真实状况。”“各厂号之信用,非一成不变者。今日信用为一等,明日或以亏蚀而降为二三四等,反之如营业有进步则本来为三四等者亦可升为一等。至于经理人之品行才力,与信用有密切关系,此皆非一二次调查所能得其梗概者也,必须详知该人该号以前之历史及随时营业情形,然后方能确定其信用之程度。”刘大钧认为,那种以调查表填报形式来反映厂号的信用情况,只能